



○滕 玉 主编

70年党建纵横谈

●军事科学出版社

70年党建纵横谈

主审 李维新

主编 滕 玉

军事科学出版社

70年党建纵横谈

主审 李维新 主编 滕玉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军4225印刷厂印刷

开本350×1168毫米 1/32 9.5印张 250千字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800021-356-0/E·285

定价：4.80元

目 录

党中央在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理论贡献·····	叶朝明 (1)
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王 勇 (10)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历史的探讨·····	黄建峰 (20)
论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王维军 (30)
我们党能够经受住关键时期的严峻考验·····	李祥斌 (37)
党与军队关系的哲学思考·····	翁世平 (44)
人民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	张晓峰 (51)
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王学伦 (60)
党指挥枪的历史经验·····	徐 舸 (65)
论我党对政党与军队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王义昌 王芹木 (74)
论党在新中国初期的廉政建设·····	李洛荣 张军赋 (83)
新中国初期反腐败斗争的回顾与思考·····	张继国 (98)
对“和平演变”战略形成的探讨·····	刘宏煊 熊志勇 (107)
我党反对“和平演变”的历史考察·····	史滇生 (119)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反对“和平演变”·····	刘春盛 (131)
论我党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战略方针	
·····	张海赴 王德庆 (136)
农业合作化与农村改革的历史思考·····	熊志勇 刘宏煊 (150)
论党在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刘庆胜 (160)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胜利的旗帜	
·····	滕 玉 (167)

论提高普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

.....牛广和 王 真	(182)
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王英林	(189)
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贡献.....岑万洪	(199)
邓小平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卓越贡献.....杨生运	(209)
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思考.....王 真	(223)
新时期思想建党探讨.....孙夏耘	(233)
坚持“两个改造”，加强党的建设.....张守刚	(242)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努力提高决策水平.....黄德严	(253)
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郑 风	(259)
党风建设的历史回顾与思考.....许遗锁 赵克舜	(267)
我们党面临的一项战斗任务.....杨永德	(284)
编后记.....	(295)

党中央在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理论贡献

叶朝明

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是我们党第一次历史性转变。而从“八七”会议到党的“六大”又是转变的关键。在第一次大革命胜利进展的情况下，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加上我们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使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从此革命转入低潮。中国革命何去何从，我们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时，党内既有人从右的方面抛出了“二次革命论”、“取消革命论”，又有人从“左”的方面提出了“无间断革命论”。要把中国革命进行下去，就必须从理论上澄清是非，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道路以及革命斗争策略等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党中央在历史性转变的紧要关头，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

正确地分析形势和社会矛盾，认清革命的性质，是制定革命斗争策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首要任务。1927年9月，宁汉合流，在南京建立起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这个反革命统治完全继承了北洋军阀的衣钵，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工农群众，摧残民族工商业，致使农业萎缩，工业凋蔽，人民生活更加恶化，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加深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清算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后的方针，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1927年8月7日召开了紧急会

议。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正确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种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38页）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会议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许多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之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不但反对封建制度的余孽，并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83页）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大革命时期一样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大会还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39、240页）。因为土地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紧密联系，“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39页。会议还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有生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这就明确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党的“八七”会议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任务、内容、前途的认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在会议的文件中已经包含一些“左”的倾向和“无间断革命”的思想，并且提出要反对一切资产阶级。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在中央“十一月会议”中表现更加明显。

1927年11月，党中央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在上海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会虽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但在一系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瞿秋白等人虽然承认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但又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

“无间断性质”，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合并到民主革命阶段去完成。不过，这种错误认识很快就由于党的“六大”的召开而得到纠正。

1928年6月，党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并明确指出，国家的真正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因此，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真正统一”，“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69、170页）。大会还批判了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指出“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同上第169页）。同时，大会又明确了“中国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无产阶级领导权已经在此一革命阶段中建立起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同上第387页）这样，既区别了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又指出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联系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必然性。

只有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才能制定出正确的革命路线，开辟正确的革命道路。党中央在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理论探索，使全党对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有了明确、统一的认识。这对于确定党在第一次历史性转

变中的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建立农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摆在全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夺取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汹涌澎湃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后，全党痛定思痛，不能不认真探索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党中央最早提出的“农民割据”、“农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较早的探索。

早在1927年7月，临时中央决定集中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原北伐军一部分在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到广东去“号召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38页），再行北伐，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虽然这条路行不通，但南昌起义前委在军事实践中却产生了“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后取广州的思想（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5页）。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率领剩余部队转移去湖南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一个站脚的地方”的思想。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不自觉的农民割据和农民革命根据地思想最早的孕育。

“八七”会议上，确定了组织农民秋收暴动的政策，规定“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准备农民总暴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25页）秋收起义发动以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对农民割据问题有了初步的自觉认识。1927年10月，《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两湖的土地革命“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同上第314页）。10月中下旬，中央关于《湖南省委工作决议草案》中又指出：“在力可以攻城可以占据数县的地方，省委应当坚决的领导这许多农民攻城或占据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以发展各地的运动”。同年11月出

版的《中央通讯》中发表的《湖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中又提出，发展“暴动创造一独立割据的局面”。由此可见，在“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很快就认识到“握得某几县政权”，“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创造一独立割据局面”，对于革命发展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并且向几个省委提出了实行“农民割据”，建立“农民革命根据地”的要求。

党的“十一月会议”虽然通过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决议，但中央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政权和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忽视，而且还要求各地的农民起义军都要建立起若干“割据局面”。以后，这样的认识又进一步发展。1927年12月为配合广东暴动，《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湖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局面。中央得知朱德等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粤湘地区后，立即派专人携带中央指示信前往联络，令该部在湘南或粤北建立武装割据的苏维埃政权。指示信中还要求朱德部与毛泽东率领的农民军“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53页）。

瞿秋白本人在这一时期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各地农民起义和农民割据区域的发展，也促使他的思想有了一定转变。1927年12月，他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分析了农民起义和游击战争的客观社会原因，对中国的农民起义和游击战争等问题，发表了比较深刻的见解。他说：“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阶级的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成全国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此起彼落，而不相呼应的暴动。”要使游击战争能够持久，要使工农游击武装能够长期生存，求得发展，“便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以及使各省各区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

大范围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85、287页）。虽然文章中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但也表明了瞿秋白在理论上开始了对工农武装割据问题的探索。

党的“六大”进一步提出要发展扩大割据领域。在“六大”会议及通过的决议中，批评了许多苏维埃区域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指出：“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党部及苏维埃，务要尽力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保障”。“领土的扩大可由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苏维埃当以武力进攻邻区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区区域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51页）。今后的任务就是“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彻底的实行土地纲领”，“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同上第186—187页）。党的“六大”，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也尚未认识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夺取全国政权中的作用，但已不再是一般地提出“农民割据”、“农民革命根据地”问题，而是要求进一步发展、扩大这种割据局面，这对以后全国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从南昌起义到党的“六大”，中央虽然一直强调以城市为中心，没有把建立“农民割据”、“农民革命根据地”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但中央毕竟已经提出了“农民割据”、“农民革命根据地”思想，而且还一般地包括了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重要内容。特别是中央还提出了建立“农民割据”的若干可能条件，如在敌人统治薄弱、力量空虚和矛盾较多的地方，在两省或几省边界地区，在农运发达或有革命影响、有群众武装的区域等，都有建立“农民割据”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对于后来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关于土地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

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

它关系到一个革命政党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就认识到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分析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时，中央就指出：“我们革命已经到了最严重而向新的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方能使无产阶级真正获得领导权，而求达工农独裁之实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联合并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完成民权革命，而进于社会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27页）

“八七”会议上，我们党树起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大旗，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坚定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同时，鉴于我们党许多优秀党员和革命者被屠杀，大部分农会被摧毁，工会被解散，革命力量严重削弱，因此确定了这样的策略方针，即“在严重的环境之下，不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设备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很充足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改进这个变革的关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65页）。会议还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敌人状况的分析，确定了斗争的主要方向，即主要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会议还分析了敌人统治内部的矛盾，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崩坏，军阀的分裂和互斗，蒋介石的下野，武汉政府内不可避免的纠纷分裂割据的大扰乱”（同上第285页）。因此决定利用敌人的矛盾，发动起义打击敌人，确定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以后中央又向湖南湖北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他们利用宁汉军阀战争，发展革命大好形势。这些策略思想在当时都是十分正确的。但“八七”会议时，我们党还没有认识到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

在中央“十一月会议”上，“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完全否认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形势，夸大了敌人内部矛盾和

国民党统治危机，认为当时革命“无疑是在高涨”，“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在斗争策略上，不区分必要的退却与右倾逃跑的界限，而是一味主张实行盲目的进攻，并把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一概视为机会主义，制定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盲动主义的总策略。在组织暴动时又强调以城市为中心，认为“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阶级关系上，断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3、366页）。瞿秋白等人还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走狗”（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82页）。因此，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这样，在斗争主要方向上发生了偏差，把本来可以争取到的力量推到了反革命阵营。由于策略上错误，匆匆忙忙组织的许多暴动都先后失败了，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

党的“六大”召开以后，很快从总的策略上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正确分析了形势，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因此“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80、177页）。同时，大会又指出，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没有能力彻底消灭革命，革命力量不仅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能够不断发展。另外，引起革命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必将促进革命的发展。根据分析，大会确定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如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的那样：“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4册第180页)。但“六大”在阶级关系上却没能纠正“左”倾错误，仍然认为“中外资产阶级都是一样的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群众，都是我们的敌人”。对小资产阶级上层“同样实行阶级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22—223页）。这在对敌斗争的方向上，是一个失误。

党中央在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时期，认真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进行了可贵的、艰难的探索，这对于我党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王 勇

我们伟大的党诞生整整70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征途中，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艰难，英勇奋斗，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并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又赢得了辉煌胜利。然而，正当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跨入90年代，同心同德地为实现20世纪最后10年的伟大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我们党却不得不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种思潮，回答这样一个早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究竟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一）

从我国革命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30页）“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同上第231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中国近代历史证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一天天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拯救危亡中的中国，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轰轰烈烈，曾经震撼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终因

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而归于失败。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以前的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都提出过种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方案，但都行不通。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之路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失败；而以“变法图强”为口号的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派，虽然也曾搞成一个“百日维新”的局面，但终因敌不过封建守旧势力的屠刀而败下降来，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英勇就义前，也只能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慨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政党，确实比改良派大大前进了一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和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不小的贡献。但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软弱，注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的果实施即落入了封建官僚袁世凯的手中。80年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记录，多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种种救国的方略，结果都灰飞烟灭，使得无数志士仁人不得不抱恨终天。

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失败？历史昭示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和不足，也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无力领导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外国资本主义和侵略势力更不允许中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能与之抗衡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必然要扼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展。从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失败，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天折，都说明在中国已经不存在由中国资产阶级政党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条件。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以后，究竟谁能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历史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能够担负此项重任者，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也就没有社

会主义的新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立即以中国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上。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破天荒地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由此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密切合作，共同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同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意识和为了民族利益善于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奋斗的伟大气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吸取了教训，开始转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时期。在此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正确发展道路的开辟，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要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靠中国共产党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是不行的，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运用统一战线武器，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反对蒋介石。这对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影响。由于我们党长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绝大多数党员来自于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因此，如何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否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关键所在。为此，党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党员、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正确主张，并且创造了整党整风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如何走，如何壮大革命力量，以及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先锋队性质等问题的解决，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